

第 1 章 我来了

2002 年夏天的某一个早晨，外地来京青年刘小幼坐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着天安门城楼。他毫无紧迫感地看着那些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在毛主席的下巴颏儿底下穿来穿去，从容而有序。他们的从容好像在说这是我的，这个城市都是我的；他们的有序好像在说，既然是我的那还有什么可急的？

刘小幼这一次是为了北京而来北京的。

在此之前，北京一直在刘小幼行程的起点与终点的中间。他路过了她，打量了她，并且停了停脚步，但他没有进入。在火车站和机场，刘小幼看到数不清的人毫无顾忌地进入与离开，他们带着自己老婆都无法忍受的体味，和这座城市发生这样亲密的关系，仿佛她只是一座城市。他们的手里攥着票，汽车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他们握着那张票，就像握着桑拿浴室里的塑料牌。

刘小幼没有，他对待别的城市可以像他们一样，手里握着票，轻易地来或去。一边害怕着她，一边享受糟蹋她所带来的快感。

可北京不是的，北京不是的，他知道北京不是的。他要专为北京而来，而北京正在这边等他。别人看到她的美，并且掠夺。刘小幼从电视上、报纸上可以看到，他们成心要毁了她，让自己

成为最后一个占有过她的人。他们偷走了她的钗环，撕碎了她的衣服，用唾液在她身体上留下斑斑污迹，到处写满了他们曾经来过。但即使这样，她也不曾呻吟一声，她用沉默蔑视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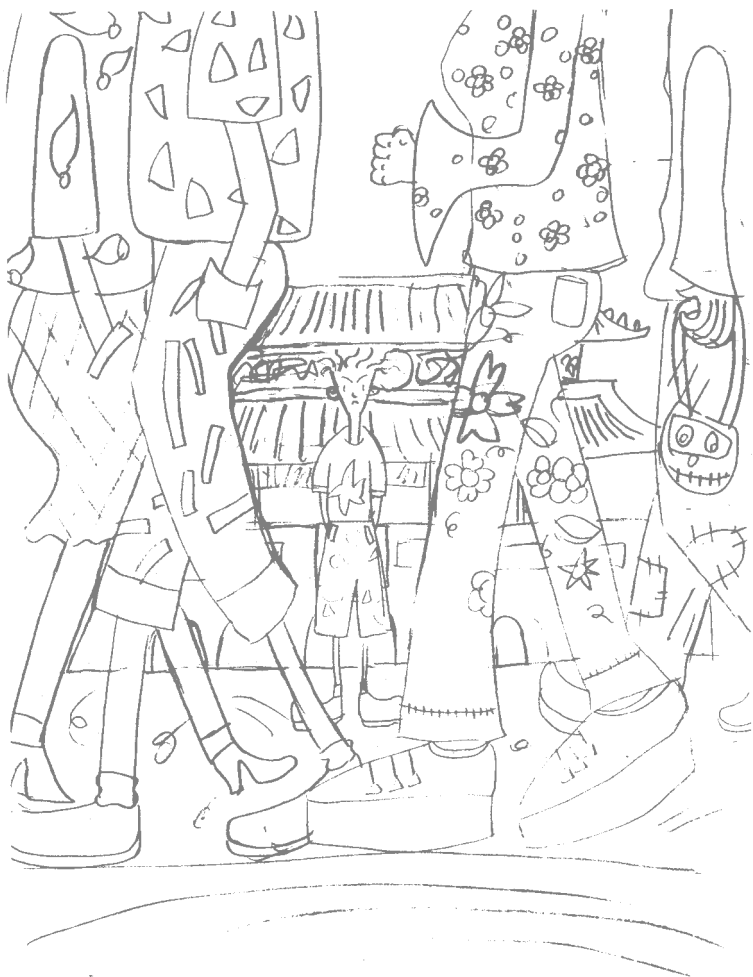
这样想让刘小幼心疼，但是他知道他们毁不了她，因为他还没有去过，而北京正在等他，她把美丽收紧了等他。她等着刘小幼，等着他来的那一天。看见他心疼地看她，然后就把受伤的身体和心灵一起打开，那里面藏着一滴眼泪。

那时候刘小幼就快把《大话西游》看烂了。关于一万年的那句对白，留在孙悟空心里的那滴眼泪，成了所有浪漫梦想的终极。

可是对刘小幼来说，藏在北京心里的这滴眼泪不是浪漫，那是他前三分之一人生的真实梦想，比一万年可要实在多了。

刘小幼真的来了，也真的坐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就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这些有序移动着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他们都带着一种毫无变化的表情，甚至没有人多抬一眼看看毛主席，看看英雄纪念碑以及天安门。刘小幼看不到在强制维持着秩序的警察，他看见的是有序的冷漠，就好像他们都没把这个伟大的地方当回事儿。

刘小幼有点儿生气了。他坐在城楼的对面，混杂在一帮又一帮的旅游者的腿中间。那些腿来回拖沓，不时地遮挡住他的视线，于是制造出一种毛主席一会儿用左眼看他，一会儿又用右眼看他的效果。那些腿有时也会停留一会儿，随着“咔咔”的几声响过后，他们重又开始移动。那“咔咔”的几声响代表了他们曾经来过，刘小幼能想像出在照片的全景里，天安门城楼被如何整



他坐在城楼的对面，混杂在一帮又一帮的旅游者的腿中间。那些腿来回拖沓，不时地遮挡住他的视线。于是制造出一种毛主席一会儿用左眼看他，一会儿又用右眼看他的效果。

体地收纳进镜头，而站在镜头前的人几乎跟周围的闲杂人等一样无关紧要，只是作为一个证据存在。刘小幼生气的同时感到孤独，有谁能像他这样一边欣赏着她一边为她心疼呢？又有谁能理解这个青年满腔的热爱与赤诚呢？如果有，那他一定就是那个童年的刘小幼。

童年的刘小幼不是一个刘小幼，是全国上下好几千万的刘小幼。每一个刘小幼都唱着同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他们唱着天安门，语文课本的封皮上画着天安门，晚上睡着的枕头上绣着天安门，为天安门点缀的是一枝红梅正在永不败落地开放。他们是纯洁的。这些纯洁的小心眼儿里爱着的是同一个地方，能同时被几千万个纯洁的人纯洁地爱着，天安门成了信仰。这个地方成了刘小幼对北京最具象的膜拜，带着不可亲近的神秘感。

刘小幼是早晨四点多钟到的天安门广场，他没想到人会这么多，也没想到凌晨的北京是这样冷。他骑着自行车从一出门就没感受着温度的存在，可到达天安门的时候他还是汗水涔涔。站立了十分钟之后，他感到冷了，小风飕飕的，身上的汗在挥发，更冷了。别人好像都比他有准备，他们聚成一群一群或一对儿一对儿的，穿着暖和的衣服坐在地上，打着扑克或聊着天，屁股下面垫着书包或者报纸。只有刘小幼是单凭一腔热情而来，但别人的准备不代表没有热情，他们让热情更理性、更郑重其事。刘小幼在现实具体的冷里，后悔了自己毫无准备的热情。

刘小幼期待着升旗的开始，升旗一开始就代表太阳也得升起来了，太阳一出来，现实具体的温暖将随之而来。

升旗开始的时候，刘小幼就彻底地明白了，准备好是绝对正确的，准备好让热情变得更崇高了。

如果不准备好这几个齐刷刷的小伙子，对着几个歪瓜裂枣我们没办法自豪。如果不准备好“咔咔咔”齐如刀削般的脚步，对着踢里趿拉的一路小跑儿我们没办法庄严。如果那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准备好那潇洒的一抖，我们就没办法血脉贲张。那个一抖手的动作在瞬间超越了刘小幼心中的所有偶像，他是不真实的存在，但只有你永远崇拜而永不能模仿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偶像。那团红色“呼啦”一声张开了，刘小幼就好像一下子被击中了太阳穴，鲜血从里面模糊了他的眼睛。你看见了什么？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胸腔里“嘭”的一声。人的胸腔里轻易不会那么“嘭”的一声，即使看见在心里爱得要死要活，嘴上却说不出来的姑娘，刘小幼的胸腔也不会轻易就为她“嘭”那么一下子。

一大群人围成一圈，就那样沉默地站着，头随着红旗升起的角度一直在调整与脖子的关系，风吹得国旗“哗啦啦”响。很多人的嘴在动，他们就像在舞台上对口型的演员，嘴唇跟着歌词一张一合，可是没有人出声。这不是假唱和欺骗，这是因为他们渺小得不敢唱。就在国旗要升到顶的时候，刘小幼觉得眼泪流出来了。眼泪是一下子就流出来的，不可控制。在早晨清凉的风里，这些眼泪热乎乎的。在眼泪流下来的时候，刘小幼感到鼻涕也流出来了，清凉凉的，他吸一下鼻子，鼻涕又回到了鼻子里，更凉。

红旗升起来了，在国歌的最后一个强劲的节奏里，红旗准确地顶在了旗杆的顶部，在刘小幼的心里发出“当”的一声。可刘小幼心里的旋律还在继续，他一直抬着头注视着哗啦啦响着的旗

帜。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刘小幼的心里越来越空，越来越慌。他知道仪式结束了，但他找不到结束的办法。庄严的“咔咔”声走远了，人群越来越稀薄，广场上重新有了唧唧喳喳的人声。可这里还有一个人，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仪式的结束应该怎么样。

刘小幼当然还是停止了他的仰视，但他没有离开，他就坐在广场上。

2001年夏天的某一个早晨，外地青年刘小幼坐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着天安门城楼。他毫无紧迫感地看着那些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它们在毛主席的下巴颏儿底下穿来穿去，从容而有序。

2000年的春天，刘小幼从南方回到了老家。2001年的春天，刘小幼又离开了。对所有知道他离开的人来说，这次的离开不同以往，他扯了个举重若轻的谎，得以在设置的重重关卡面前蒙混过关。

他在包里装了几件衣服，然后对他妈说，我要去北京玩儿几天。

他妈说，你要去多久？他说没有多久，看看能用多久，也就几天吧。

他妈说，你去了住哪儿？他说，我就住旅馆。

他妈说，旅馆安全吗？再说你认识谁呀。他说，成千上万的人都住旅馆。

他妈又说，你都带什么了？他把包儿打开说，就是几件衣服。

他妈说，这不行，要是下雨怎么办？他说下雨我就不出门，我在旅馆里躺着看电视。

他妈说，那你也得带点儿药呀，感冒了怎么办？他说，怕噎死还能不吃饭啦。

他妈还想说什么，刘小幼说，要不然我不去了，干脆把我系你裤腰带上得了。

即便是这样，在刘小幼离开的那天，站台上仍然站了一大一两堆儿送他的人。以他妈为首的家人站成了一大堆儿，其中包括他爸和他妈，哥哥、嫂子和侄女；以他女朋友为首的站成一小堆儿，就是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妈。两堆人之间的距离就像两个核反应堆之间的距离一样，为了防止一触即发而小心翼翼。

刘小幼在车厢里对着外面站着的两堆儿人挥手，他的眼睛一会儿看着这边儿，一会儿看着那边儿，胳膊的角度也在不断调整。刘小幼一边挥着手，一边在心里对向他挥手的人们说，再见，核反应堆们。

行囊里几件简单的衣服，就像不适宜长期作战的轻兵器，但刘小幼把他的理想在心里磨得霍霍生光。

在从南方回来的一年时间里，用刘小幼他妈的话说就是什么也没干，用刘小幼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也没干成。在刘小幼他妈的眼里，刘小幼把每天的一半时间用来脱离她的视线，在城市里某个她不知道的角落里晃呀晃；另一半时间她是能看到刘小幼的，他就在家里的床上睡呀睡。刘小幼把时间分配得大体均匀，每天上午大约十一点钟的光景出门，到夜间的十一点钟回家。早上出门前，老太太准备好的早点就放在桌子上，晚上回家时，老

太太给他剩的晚饭还在桌子上。在刘小幼的眼睛里，那几个碗和盘子就跟长在了桌子上似的，从来不换地方，天天在那儿等着他。搞得刘小幼在哪天起床或回家的时候看不到桌子上的碗时，就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或者是家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

刘小幼在刚回来的时候，觉得家真是太温暖了，连犄角旮旯都透着那么亲切。刘小幼他妈的手在刘小幼身上一通胡噜，胡噜到哪儿都说上一句，瘦了。搞得刘小幼差点儿掉下眼泪来。老太太说，我这老儿子这两年可给累坏了，得好好歇歇。

半个月以后，老太太说，你打算干什么？你这样天天晃了睡，睡了晃，时间分得倒是挺平均，可你总要干点儿什么吧。你准备晃到什么时候呢？

刘小幼说，说让我好好歇歇，这才几天脸就变了。

老太太说，歇也得有时有晌，我让你歇，你这是歇吗？天天到外边穷晃。

刘小幼说，谁说我是在晃，即使是，我也是在为了干点儿什么在晃。

后来他妈说他果然没有白晃，他晃到了一个比他小五岁的女朋友。刘小幼自己知道他都晃什么了，可他没对他妈说，因为结果跟白晃一样，说出来等于废话一堆。

刘小幼刚回家的那段时间还是把自己搞得挺忙的，他和两个大学时候的同学结成了死党，一个是刘刚，一个是霍明起。刘小幼在脱离他妈的视线时，不是跟刘刚在一起，就是跟霍明起在一起，要不就是刘刚加霍明起再加上他三个人在一起。刘小幼觉得自己要是有一个人在街上晃，就成了他妈说的那种穷晃，可他们是三个人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就给人一种正在密谋什么的感觉，

就好像在合计着一件挺重要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穷晃。所以刘小幼老觉得自己是在干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干。

刘小幼他妈说，又出门？刘小幼说，是。

刘小幼他妈说，又是找刘刚和霍明起？刘小幼说，是。

刘小幼他妈说，你们三个人混能混出什么来？

刘小幼不爱听了，说，什么叫混？

刘小幼他妈说，三个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谁都没个正经工作，天天一堆儿玩，不见干什么正经事儿，不是混是什么？

刘小幼说，谁说三个人都没工作，刘刚就有工作。就是三个人都没工作，那才好商量着一块儿干点儿什么事，天天窝家里才叫混呢，这怎么叫混呢？

刘小幼他妈不说话了。

开始的时候，刘刚和霍明起老问他在南方怎么怎么着的，他们在他们问了以后就开始讲，后来刘刚和霍明起发现有些问题他们已经问了好几遍了，刘小幼也回答了好几遍了，当每一次的语气和内容都没什么变化的时候，问题显然就丧失了意义，他们就不再问了。当刘刚和霍明起不再问的时候，刘小幼只好自己主动地把那些讲过的话讲完一遍又讲一遍；当他自己都觉得这话好像已经讲过了的时候，刘刚和霍明起就会说，你总算想起来了，这话已经说过好几遍了。

然后，刘小幼就问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老家怎么怎么着的，刘刚说没什么，还那样儿。刘小幼说什么叫还那样儿，总得有点儿事可说吧。霍明起说还能怎么样，可不就那样儿呗。

这时候，他们就陷入到一种无聊的境地，裹着浴巾躺在澡

堂子的床上，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样慢慢躺着躺着就困了，然后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刘小幼看看表，快十一点了，就说，回家回家回家，该换地方睡觉了。

说完这话以后，刘小幼在床上愣坐片刻醒盹儿，他想到了他说的三个回家无意中连成了一串，可又恰好是三个，就好像是平均分配给了三个人，一个人回一个家，各回各的家。刚才的嘴吐噜得太快了，刘小幼又重复了一遍，数数那串儿回家到底是不是三个。这么来回吐噜了好几遍以后，刘小幼就觉得不无聊了，生活中到处都是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就很有意思。

过了一个多月了，刘小幼、刘刚和霍明起把三个人在一起的习惯搞得就跟上班似的准时。他们一般的安排是刘小幼和霍明起从十一点半就进饭馆，吃冷面一直吃到两点。再然后就是上澡堂子，在澡堂子里把肚子里的冷面焐热了，消化了，再睡个小午觉，等出来的时候就到四五点了。然后刘刚就会在下班以后赶过来和他们会合，或者是他们到刘刚的单位去找刘刚，刘刚在电影院给新电影画预告牌，刘小幼和霍明起坐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等着刘刚下班，然后三个人就再去饭馆里继续吃冷面。

一般情况下他们中午不喝酒，晚饭的时候会喝点儿啤酒，三个人分完两瓶啤酒以后他们就开始胡说八道，甚至有可能吵起来。喝完酒以后他们有时候还回电影院去看电影或者录像，有时候是坐在霍明起从他爸那儿开来的车里听收音机，偶尔还会到一些小歌厅的包房里唱唱歌。他们唱歌的时候一边唱一边接着吵，搞得自己就跟三个生意人似的，一边儿要搞好关系，一边儿又要讨价还价。吵完唱完以后，他们就回家睡觉去了，这样第二天醒

过来，就不记得昨天谁跟谁吵过了，就又都愉快地打电话相约去上班。

他们通常事后都不回忆昨天喝完酒以后为什么吵起来的，但一般那些争吵都是从回忆开始的。他们在小饭馆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着窗外走过的姑娘，刘小幼的毛病就是看姑娘总是先看姑娘的胸，在接连放过去三个之后，刘小幼终于看见了一个比较丰满的走过来。

刘小幼说，你们还记着咱们班那个女生吧，就叫冯韵的那个。

霍明起说，瘦得骨头一根儿一根儿都能数过来，可胸前就跟绑俩气球似的。

霍明起的话一下子就点在了刘小幼想说的重点上，用词的准确简直让刘小幼觉得这个刚刚开发出来的话题，没法从自己嘴里得出更精确和精彩的观点来，这让刘小幼一边儿佩服霍明起一边儿气愤他提前掐断了一段儿本来能挺长的议论。然后刘小幼就恶意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追人家的时候怎么不说人家绑俩气球儿呀！

霍明起说，扯呢！谁追过她？

刘小幼说，没追过你脸红什么？

霍明起的脸红扑扑的，刘小幼的脸也红扑扑的，他们俩一喝酒脸色就变，变得红扑扑粉嘟嘟的，很健康很害羞的样子。可霍明起现在的红扑扑不是害羞，他有点儿恼怒地说，废话，你他妈脸不红？

刘小幼说，红，可我脸红是喝酒喝的，你是心火烧的。

霍明起说，你要是不惦记着，你平白无故提她干吗？

刘小幼说，少打岔，冯韵都跟别人说了，你在她家给她画过人体。

霍明起“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酒瓶在桌子上跳了一下，酒杯也跟着跳了一下。刘刚看着杯子说，流出来了，流出来了。声音急得不行。

霍明起说，哪个孙子说的？你听见冯韵说啦？

刘小幼说，废话，她能跟我说吗？可大家都是那么传的，你问问刘刚听过没有。

刘刚很犹豫，他看看刘小幼，又看看霍明起。然后刘刚说，我听说过，可冯韵没说谁给他画的，她就说有一男生上她家给她画过人体，没说是霍明起。那时候不是正演什么《泰坦尼克号》吗？她说那男生当时也想跟她那什么来着，她没让。

然后刘刚又说一句，我操，谁信呀？

刘刚那句谁信呀，不知道是怀疑冯韵没让那个男生上的真实性，还是怀疑霍明起到冯韵家里画画儿的真实性。刘小幼看出来了，刘刚不想明白地说他知道的事儿，其实是不愿意热闹这么快结束，他留点儿悬念，就是为了让他们俩能够继续吵下去。

在歌厅的包房里，就刘刚一个人在唱《爱的代价》。

霍明起说，我他妈要给她画了，我是孙子。

刘小幼说，你现在说是孙子有什么用，这不全凭你嘴说吗？

霍明起说，咱们去问问冯韵你敢不敢，我要是给她画了我是孙子，我要是没有给她画你是孙子。怎么样？

刘小幼说，行，你有冯韵电话吗？

霍明起说，没有，你有吗？

刘小幼说，没有。

刘刚掐断了那句没完没了的“走吧，走吧”，说，我有。

刘小幼说，最他妈坏的就是你。

要想把讨论升级到争吵，一定需要三个人对待同一事物的热情，可是他们的热情好像都还停留在过去，对个人回忆的热爱让他们坚决维护它的正确性和惟一性，不允许别人的误会和曲解，于是争吵就发生了。可关于现在和未来实在没什么好吵的。他们连讨论的时候都是有一搭没一搭，有气无力的。

刘小幼说，刘刚你以后打算怎么着呀？

刘刚说，我想跟你一样，上外边看看。

刘小幼说，雷声大，雨点小。我去的时候叫你你怎么不去？

刘刚说，我妈不让。

然后，这个话题就死在这儿了。

刘小幼又问霍明起，霍明起，你爸给你找的工作怎么着了？

霍明起说，正活动着呢，净看见老头儿往外拿烟拿酒的。

刘小幼说，给谁送呢？

霍明起说，管事儿的呗。

刘小幼又说，什么工作？

霍明起说，不是当老师，就是上文化宫画宣传画，没意思。

刘刚说，是没什么意思。

刘小幼说，走了两年多一点儿变化都没有，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没意思。

又一个话题死了。

刘刚问刘小幼，南方有意思吧？

刘小幼说，比这儿有意思吧。

刘刚说，南方有意思，你不在南方待着回来干吗？

刘小幼说，主要是语言环境太差。

刘刚说，你又不是上那儿学外语，还讲究个什么语言环境。

刘小幼说，是外语倒好了，问题是不是外语，你还什么都听不懂。

刘刚说，学呗。

刘小幼说，不是学的问题。是人家当着你的面儿叽里咕噜地说，你一句也听不懂。要是老外倒好了，黄毛蓝眼，一看你就没有往人家那里边搀和的想法。在南方你一看，全是跟你一样儿的人，长得比你還黑、还矮、还丑，人家说什么你根本不明白。就是那种明目张胆地当着你的面说背着你的话，那感觉特别难受。最难受的是知道你在那儿还说让你听不懂的话，就跟什么事儿都背着你的似的。反正就是难受。说了你也不明白。

霍明起说，那儿东北人多吗？

刘小幼说，不多。见着黄河以北的，我都叫老乡，我那帮同事就看得我跟我老乡的那种热乎劲儿，跟他妈离散多年的亲人似的。

霍明起说，饥不择食呀。

刘刚说，去北京吧。

刘小幼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发出“咚”的一声，他想努力再听听，是不是真有“咚”的那么一声，心跳就恢复正常了。

随着上班生活的不断延续，刘小幼觉得他们需要一个办公的地方了。冷面、洗澡加唱歌，除了看电影是免费的，其余都得花

钱。刘小幼在一个多月里花了两千多，还不包括霍明起和刘刚掏的那部分。两千多块钱在南方就是他一个人的房租加上吃饭钱，可这是在老家。老家的两千块钱真实在，跟南方比起来，就跟拿肉和白菜比差不多。两千块钱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全部收入，过完日子还能存那么几百块。刘小幼觉得这么花钱挺对不住家乡人民的，也对不住自己在南方辛苦的那两年。

刘小幼租好房子，从家往外搬的时候，他妈说，你干吗？

刘小幼说，我跟几个朋友商量干点儿事，在家说话不方便，出去说也不方便，租个房子倒挺方便，又能说话，又能睡觉。

老太太说，什么朋友？不就是刘刚和霍明起吗。你们能说什么事儿？

刘小幼说，说什么事儿告诉您，您也不懂。

老太太说，说事儿就上家说来，你觉得不方便我给你腾地儿。

刘小幼说，我们又不是弄个家庭作坊，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儿呀。

老太太说，事儿还没一撇呢，你张罗得倒挺欢，外边儿租房不要钱啊？

刘小幼没敢说自己的正当理由，正是为了省钱才去租房子。要是老太太知道他一个月造进去两千多，三宿睡不着觉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刘小幼说，花这点儿小钱就是为了明天能挣到大钱。不会花钱哪儿能挣着钱呀？

老太太说，少来这套，你老爷原来当地主的时候，还跟长工一块儿干活儿呢，到死连个净面馒头都没吃过。那房子那地哪个

不是省吃俭用出来的？

刘小幼说，所以他到死都没能从小地主进步成大地主。

老太太在旁边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办公地点真是好地方，刘小幼、霍明起和刘刚欢欣鼓舞地想。办公地点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没指出新方向，但突然指出了一个新问题，总得干点儿什么吧。

刘小幼说，咱们是不是也得干点儿什么呢？

霍明起说，干什么呢？

刘刚说，干装修吧。我有个哥们儿干装修，发了，现在开着帕萨特。

刘小幼说，干装修得有路子，你们能揽着活儿吗？

刘刚说，看怎么说了，油漆工在马路边上竖个牌子还能揽着活儿呢。

霍明起说，油漆工是揽刷油漆的活儿，你揽的是装修的活儿，就看咱们这俩人，这间破屋子，谁给你活儿。

刘小幼说，再说家庭装修根本不赚钱，要干就得干工程装修，工程装修没路子谁给你呀？

刘小幼说，干一个平面设计公司吧，设计公司可大可小，三两个人再搭两台机器就能干，本儿小利大。

霍明起说，本儿小利大？你在南方时间待长了吧。这儿谁给你设计费，也就饶上点儿印刷的活儿，能挣点儿钱，再不然就是给你点儿出片子、打样儿的钱。

刘小幼说，凭什么不给设计费，三个鲁美本科怎么说也不算软吧，不给设计费给制作费，脑子进水了。

刘刚说，你脑子才进水了呢。这儿还没有给设计费的习惯呢，设计算什么，设计就是动动脑子，脑子全是些看不见的东西。在这儿谁花钱买看不见东西呀，就是给印张单页，拿在手里也算是张纸吧，一张纸也得花钱才能买回来吧。设计，设计有什么？设计连张纸都不是。嘁！

霍明起说，要不咱们倒腾光盘得了，成立一个“鲁美·黄色 1995”音像公司，把这儿弄成一黄色光盘集散地，小幼负责从南方进货，刘刚负责把人带来，我跟这儿收钱。慢慢发展大了，弄不好把咱们的营销网点铺满整个东北大地。在所有卖的光盘上都印上防伪标签，把咱仨的头像印上去。酷毙！

刘刚说，回头所有鲁美 95 届的后背都贴一个条儿，上书八个大字“我是 95 的，可是不黄”。

三个人高兴得哈哈大笑，关于干点儿什么的话题在哈哈大笑之中又一次死在这儿了。

在后来的好几天里，刘小幼又下了一次决心，一定得让话题继续下去，绝不能再死了。要是在南方，这么晃只能等着饿死，他要拿出他在南方时的奋斗精神来，他回来不是为了晃的，他从有意思的南方回到没意思的老家来，只能自己搞点儿意思出来。

咱们干个广告公司吧。刘小幼对刘刚和霍明起说。

广告公司既能搞设计，又能干媒体，素质高的客户咱们就收设计费，碰上没文化的咱们就做媒体，代理发布，怎么样？刘小幼真怕这个话题一被刘刚和霍明起接上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只能自己说了又说，一直到把两个人的心说活泛了。

刘小幼说，我告诉你们，越是小地方小广告公司越是好搞，